

# 苏联：在“风险社会” 的背景下帝国的缔造与终结<sup>1</sup>



莫尔多采夫·安德烈·尤里耶维奇

法学博士，教授  
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与服务大学俄罗斯与外国法律理论和历史系教授  
全俄国立司法大学罗斯托夫分校法律与国家理论和历史系教授  
aum.07@mail.ru

玛米切夫·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

政治学博士，法学副博士，副教授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政治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实验室主任  
mamychyev@yandex.ru

莫尔多夫采娃·塔季娅娜·瓦西里耶夫娜

文化研究博士，教授  
塔甘罗格经济管理学院人文系教授  
aum.07@mail.ru

## 摘要

本文阐明并分析了与苏联形成和解体相关的风险因素，这是帝国政治和法律空间的原始形式，是国家和超国家社会政治认同的一种方式。作者们在“风险社会”范式的背景下，考虑了国内政体中政治实体的整合和瓦解的多维过程，同时认识到其方法基础。苏联的出现和崩溃，都是对由致风险性升级（避免这种风险的选择）引起的俄罗斯政治和法律体系危机的客观答案。当然，在考虑此类问题时，不可能消除原始的精神文化，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矛盾的俄罗斯历史中。

关键词。苏联、俄罗斯帝国、风险、危机、政治-法律空间、政治-法律心态、国家、共和国、君主制、联盟共和国、权力精英、政治一体化、政治分裂主义、帝国。

## 引言

在国内外的人道主义实践中，很早就清楚地表明，要解决任何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可能评估其危险等。本质上，任何对社会或其他事物重要问题的隐瞒都可能导致其完全被破坏，从存在领域中消失，这与医学实践中未及时发现诊断相似。

在不同国家的命运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在权力精英的推动下，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领域“弥合裂痕”的过程没有重大改变国家发展战略本身。这只是一个特定国家崩溃的延迟，通常是由于某人的“恶意”影响（领导人、政党、共济会等），因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种崩溃的客观原因。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包括外国）历史学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俄罗斯的事件进行展示的。他们声称，帝国的稳定，总体上稳定的发展是由共济会，“反俄罗斯”临时政府有意“破坏”的，然后于1917年4月，列宁作为“德国间谍”和最激进的政党领导人返回该国。“列宁认为，国家是公共权力机构，已被社会撕毁，并日益置于社会之上。它的支持是军队，官僚机构和警察，这些机构可利用诸如监狱之类的物质附属物……”<sup>2</sup> 关于“民主共和国”，列宁完全正确地断言，这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最佳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国具有其关键特征，它很好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力量，换句话说，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制合法化的可靠来源，尽管列宁认为民主共和国“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

然而，很明显，停留在“表面”的国家历史很难看到这样重大事件的真正原因，例如俄罗斯帝国的消失，当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现实仅在三天之内就消失了（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俄罗斯思想家在这些年中写道，俄罗斯人像从袖子上拔出的羽毛一样炸毁了整个帝国）。

的确，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不是另一种破坏性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极端主义，而是一种无休止的、大规模的、激进的、反民族的改革。这是事件的另一面。俄罗斯君主制因无所作为而垮台（其反对者利用了这一点），苏联帝国因其国家地位的“钟摆”的轻率摆动而被推翻（这也被一股具有破坏性的、据称是“自由”的力量所利用）<sup>3</sup>。两种国家政权形式都

<sup>2</sup> 阿扎尔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俄罗斯法律思想家。莫斯科：法律文献，1999年，第452页。

<sup>3</sup> 莫尔多夫采夫，玛米切夫，社斯塔帕尔，俄罗斯作为特殊文明与法律类型建立的国家//波罗的海人道主义杂志。2017. V. 6. No. 4(21). S. 492-498

<sup>1</sup> 这项工作是在俄罗斯联邦总统№NSH-2668-2020. 6“俄罗斯联邦在二十一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发展的民族文化和数字趋势”的资助下进行的。

没有察觉到历史上的挑战，原因也各不相同：君主制“被动”，拒绝“俄罗斯君主制的拯救在于其局限性”的方针，它从原则上反对国家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苏联“积极”，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改革混乱中，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明确的原则，因此，社会主义“改革模式”的前景迅速导致离心式政治进程升级、民族（在一些苏联共和国和民族主义共和国）精英化、“主权游行”、法治占主导地位（从1991年以后一直持续，例如，在1993年秋天，有关总统令№1400著名的事件），政治权宜高于正式合法性，这已经是革命的迹象（众所周知，“上层不能统治，底层不想以的旧方式生活”）。

总的来说，关于“构造”转变的性质仍有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这种转变大概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社会中的苏联广阔领土上。此外，国家政治和法律领域长期缺乏任何政治竞争成为破坏联盟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在下降（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因此颁布了禁止党内任何派系活动的禁令，后来这成为通往极具激进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的桥梁。虽然，俄罗斯社会在之前的历史时期（从伊凡三世到尼古拉二世）与最后一个社会相比，还是非常相似的。

的确，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上的统一性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能维持并不断扩大国家领土（帝国最重要的标志），还能维持社会经济和法律发展的相对稳定，甚至还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谓的反改革时期，当时俄罗斯历史上的预算首次出现盈余，后来维特进行了著名的金融改革，这促成了1913年现象的出现），当然，同样的政治一元论也导致，即使在20世纪中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的宪法和法律生活的经验（就现代意义而言<sup>4</sup>），此外，在存在苏联宪法的许多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就评估所通过的国家基本法的原创性而言，最具有独创性的是苏联1936年和1977年的宪法）。

苏维埃宪法的条款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并且也不能直接适用，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作用远大于真正参与国家法律生活。社会宪法是本着对《基本法》条款的尊重的精神提出的，但是却不能遵守它，否则苏联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所有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在苏联统治的头几年，永久的“世界革命”的想法最终失败了（图哈切夫斯基在波兰的竞选失败，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失败等等），这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生存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转变中，苏联以自己的方式造成了艰难的局面，其性质是单一的，其政治制度的动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尽管列宁在1922年击败了斯大林提出的“自治”计划，

即前俄罗斯帝国的州领土的联邦制，事实上，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维持真正的联邦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斯大林认为应立即进行改革行动，因为他相信，根据当时的外交政策“拖延等于死亡”，他的政策的实施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sup>5</sup>。在这方面，只有像苏联这样准联邦国家才能保证在20-30年内维护民族国家地位，从而确保传统上的欧亚人民，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化。

由于极权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迅速兴起（在驱逐利昂·托洛茨基之后），政府急剧“摇摆”以实现其政治领土统一，可能保留了各个国家边境的某些自治权。

总的来说，不同的苏联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基本上都遵循这种“历史客观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施加了主观影响：在内战期间，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取代了精神）的“车轮”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根本无法跳出这种束缚。尽管从原型层面上来看，苏联的形成和最终发生的结果，应该归因于更古老，以及相应的其他过程，现象，国内状态和法律历史等常数。

因此，即使作为一个初步的近似，也很明显，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传统的君主制权力关系形式，已经发展出了很多“新手”政权。在这方面，直到17世纪中叶出现教会分裂，之前都没有进行广泛的讨论（例如，西方在精神、政治和法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著名的争论），这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里有很多例子，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万四世、彼得一世的统治时期。结果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不仅是人口，还有权力精英本身。

特别是，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针对乌尔德王子（俄罗斯沙皇的近亲）的灭绝政策最终导致许多鲁里科维奇王朝消失，权力被“遗弃”。此外，在“伊凡雷帝”之后，“上等人”（大臣，贵族）的数量减少了太多，以至于根本没有人为国家服务。显然，即使在这些风险因素下，制度和领土进程，模糊时间的破坏性和随后的升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只是变得客观。正如亚伯拉罕·帕利辛所写的，“混乱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的疯狂沉默。”

然而，矛盾的是，在16 - 17世纪初，国家（君主制）权力明显合法化是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所熟知的，同时保留了最重要的基本精神支柱，例如，以当时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天主教基督教信仰为例，它并没有导致莫斯科王国的瓦解，而是激发了以前从未见过的现象和过程：“俄罗斯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后者不仅开始觉得自己是沙皇的臣民，而且还应对祖国的命运负有责任。”下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尔、多纳哥萨克斯坦尼克的小人物与普通人，在动荡和转型的时代，也成为照顾国家命运的人<sup>6</sup>。因此，一种“爱国主义”现象出现了（人民的沉默在危机中消

<sup>4</sup> 由于“莫斯科君主制具有其自己的不成文宪法，但是，该宪法的庄严表达不是在宪章和条约中，不是在制宪议会颁布的法律中……而是在纯粹的道德信念上，即确立国家和国家外部权力本质的秩序”，从上而下的建立，受父辈信仰和传统的祝福。阿列克塞耶夫，国家科学的现状及其紧迫任务//俄罗斯人民与国家。莫斯科，1998年，529页。

<sup>5</sup> 阿加金，法令，索契，460页。

<sup>6</sup> 普希卡列夫，俄罗斯社会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动荡时期）的心态//俄罗斯社会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第四期。冲击和转变时代的心态。负责编辑，戈尔斯基，莫斯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科学院，2003年11-23页

失了), 公共服务不在是为了国王而是为了祖国, 这种观念的转变, 是因祖国已经扎根于俄罗斯政治和法律文化中, 并已有数百年历史了。在波尔塔瓦战役, 1812年的卫国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年以及伟大的卫国战争中,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53年后出现了另一种情况, 苏联的极权动员模式开始动摇。在不断地放弃确保苏联稳定的旧斯大林主义战略的背景下, 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急剧下降: 在苏联社会的经济, 政治, 意识形态和其他生活领域。上届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开始加剧。矛盾的是, 从政治上熟悉的人到大多数人的完全“退出”, 对苏联的政治和领土模式将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一道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导致了众所周知的“节点”或发展周期: 国家的稳定发展在危机状态(80年代上半叶)开始发生变化, 然后又遭受了灾难(80年代下半叶), 后来导致了崩溃。“系统的崩溃摧毁了所有或大部分部件”<sup>7</sup>。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自认为准备好统治主权国家的联盟共和国权力精英的政治地位不断增强, 这是对苏联破坏性进程的催化剂。

### 方法论基础

作为研究苏联解体过程的主要方法, 从启发式的角度来看, 转向现代风险理论非常有效, 即从传统现代化转向工业现代化, 然后是后工业社会。在这方面, 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 通向另一个条道路”, 是了解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哲学和方法论指南之一。

作者们充分认识到,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力量被释放出来, 人类的想象力是无法企及的”<sup>8</sup>。显然, 任何预测这种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破坏发生时间的尝试都无法确保它的准确性, 在最好的情况下, 它能够将风险降到最低, 使其不破坏的来源, 并且激励人们去发现新的创造方式和形式, 重建不同层次的社会机体。但是, 这里还有另一件事—任何有意识地“不注意”风险因素, 趋势等尝试, 都可能导致崩溃, 特别是国家、帝国或较小的机构—政党、教会等。

在国内社会政治历史中, 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事件与被动感知风险战略有关, 最终导致了俄罗斯通常的立场“一切都会自行解决。”即使在不同的时代, 改革“努力”也经常被推翻, 从而使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和社会经济进入“听任机遇、混乱过程、自我调节”的状态。

在这方面, 根据伊凡四世的和彼得罗夫斯基的全面改革, 偏于西方化, 以及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改革有了开端, 但是最终(和以前的改革行为一样), 由于俄罗斯政治、法律和历史传统中, 政府机构的高风险表现令人瞩目, 所以改革和改革者从未受到欢迎(欧亚社会的精神保守主义), 并且, 他们痛恨政治家(这里除伊凡四世的例外)放弃了他们的努力, 摧毁了旧的事

业, 却从未在政治、法律、社会、精神等领域创造出新的、以前从未见过的良好教育。这就是当时出现的风险急剧上升情况。

“随着风险的分布和增加, 社会危险就会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们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但它们迫使人们接受一个截然不同的分配逻辑: 现代化的风险迟早会影响到生产者或从中受益者。”<sup>9</sup> 在这种情况下, 应牢记主观的“互补性”(共轭)原则: 一般而言, 任何社会有机体的风险一般都是客观的, 主观地“担负重任”: 寻求从危险环境中获得不同好处的权力精英最终会被埋在危机之中。换句话说, “钟”首先落在那些“摇摆”它的人身上(亚历山大二世, 戈尔巴乔夫等)。

“权衡”价值的方法, 特别是不同类型的策略, 在评估风险结果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帕森斯来说, 价值观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 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理想社会系统类型的观念<sup>10</sup>。斯迈泽认为, “社会(社区)的价值观”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基本

手段的共同信念。(最终价值和工具价值)’’<sup>11</sup>。

在考虑风险因素的产物时, 应该注意基本价值的关系: 维护“一切不变”的支持者, 相反, 社会力量正在为从当前危机局势中寻求不同的方法而努力。

例如,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重要的是(价值方面)以某种现代化的(可能的)选项(在一个专制苏联体制下, 事实上是一党制)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 或者更有价值的是这个“邪恶帝国”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独裁政党制度、计划经济、莫斯科对所有联盟共和国的权力的依赖等等)。当时的联邦政府没有表现出清楚明确的价值(在制度上)选择, 试图在原则上兼容政治、法律和经济价值: 维护苏联总统的权力, 苏联内部的国家主权以及统一苏联政治和法律。需要注意的是, 正是盟国(中央)的行动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上世纪90

年代初, 国内政治精英的自由派“组成部分”仍然微不足道, 它只能利用苏维埃政权结构的悲惨“失误”, 但仍不能独立展示自己。

这似乎很奇怪, 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 苏联和社会主义法律和政治价值观在政党精英的支配下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当然, 这也导致了他们的破坏性行为。自从戈尔巴乔夫一路走上打破苏联国家结构的道路, 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到最高委员会主席研究所, 再到单个总统职位, 行政权不仅没有加强, 而且还助长了分裂主义和强大的分裂趋势<sup>12</sup>。

事实上, 在任何社会风险领域(“风险社会”)的功能测量中, 都包括监管、创新、预测、不稳定(甚至是破坏性的)、机构工具和其他职能。

### 苏联的形成: 克服国家政治和法律中存在的风险。

上文已经指出, 苏联的形成过程是20世纪初摆脱俄罗斯帝国灾难的一种方式。由于20世纪初政治

<sup>7</sup> 莫罗佐娃, 俄罗斯现代国家地位问题, 莫斯科, 1998年, 13页。

<sup>8</sup> 贝克, 风险学会。在通往另一个现代的道路上。莫斯科, 《进步传统》, 2000年, 23页

<sup>9</sup> 贝克, 法令。奴隶。第25页

<sup>10</sup> 玛木特, 国家在价值方面。莫斯科, 1998年, 第六页

<sup>11</sup> 玛木特, 国家在价值方面。莫斯科, 1998年, 第六页。

<sup>12</sup> 辛尤科夫, 俄罗斯法律制度。莫斯科, 2010年版, 第383页

和法律风险的升级(“风险社会”的出现),苏联的灾难迅速消失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2月俄国帝国解体后,帝国意识并未消失。证据清楚地表明,俄罗斯临时政府(一些民主自由党)未能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从1917年2月到7月间迅速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它与古典的欧美共和制度和形式是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意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人民离开帝国就活不下去,但是帝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这种观点符合于1917年,同样1991年也是如此。

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以及进一步迅速成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其他政治力量的活动,甚至从马克思主义(即西方)立场采取行动,但事实证明,这在国家价值上是完全正确的,即从新的位置出发,但仍建立帝国。

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革命全球化)仅仅在4到5年内就被斯大林的国民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取代,它不仅成为现实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在1922年的联盟条约之后),而且巩固了苏联。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成立是俄国君主制瓦解后解决东斯拉夫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新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方法,步伐和内容取决于他的决定。未来苏联的其他问题仍然受到斯拉夫协会的影响。在这里(正如1991年一样)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关系的重要性。

内战结束后的头几年,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的领导人关于在国家间关系和乌克兰在国际上的合法性问题上,由于其不合逻辑和矛盾的性质,已经存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就乌克兰苏维埃而言,这两个问题定义了它的主权,并作为遵守俄国帝国人民自决权直至完全分离的证据,这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的。

因此,根据1920年12月31日的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苏维埃之间签署的“工农联盟”,很显然,选在新年前一天并非偶然,共和国的一些经济和基础设施人民委员被合并,

但留给了外交事务监督员,这意味着外交政策的自主权。1922年,列宁在他的文章《民族问题或“自治”》中指出,除军事和外交事务应移交给苏联管辖之外,苏维埃共和国所有人民粮食独立管理。

同样引起争议的是苏联领导人和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在国家法律政策方面的立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兴起是由于他们努力克服的资产阶级关系。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阶级基础上使社会非民族化,不是以种族和语言为基础的团结,以专业为基础的团结。

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文献(布列茨基,达什科维奇,库尔奇斯基,尤里乔克等)中,有人指出,苏联的形成历史“已被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充斥”。

尽管随后几十年的宣传试图将联盟的成立描述为“全国团结运动”,但实际上,在俄罗斯社会中,并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共鸣或社会反应。研究人员认为,原因在于,与《联盟条约》签订有关的事件,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精心策划的,它成为了官方苏联历史的基础,直到今天,几乎覆盖了每本教科书、百科全书等。

然而,关于对1922年到1930年苏联的形成过程的态度,还有另一种解释。在这里,首先,俄罗斯

公民(以前是臣民)在巨大的跨国多宗教帝国空间中生活的习惯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苏联在俄罗斯帝国边界内的形成过程被视为国家民族地位的恢复,在最初的几年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形式的政府、国家制度和领土政治安排的根本区别(尤其是在新苏联国家,真正的联邦制从未实现过)。总的来说,苏联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自己的”国家(尽管如此,宗教信仰代表仍然认为存在严重的差异,但这涉及到精神仪式领域)。

苏联解体:20世纪末,政治和法律风险的结果,是作为苏联解体的主要风险因素,结束这个国家的是“地缘政治现实”,普京总统正确地称其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可以强调以下几点:

1) 上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全球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粮食危机加剧,不仅导致各州甚至首都的粮食危机升级;

2) 缺乏公开的政治对话,既不能制定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家发展战略,也不能提供迫切需要的政治共识;

3) 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运作和管理能力下降,特别是在1982年(在缺乏明确的政治和经济方针的情况下迅速更换国家元首):最高领导和其他政党领导的合法性水平下降,权力的魅力形式已经消失,理性和传统已经不复存在;

4) 加强党派精英的西方化(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导致了他们有目的的活动,削弱了中央和地方的党领导和党组织(第6条被排除在苏联宪法之外),在这种背景下,各种自由主义或宗教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开始兴起(苏联的联盟共和国经常出现,特别是在穆斯林边境,与新的或“重建”的前权力精英们融合在一起,正是通过煽动分裂情绪来争取独立);

5) 联盟共和国的“总统”和主权大游行(1991年),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随后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使苏联的持续存在受到质疑,因为多个主权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政治和法律空间。

我们可以,也应该以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哲学,文化的方式来对待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俄罗斯停留太久(没有国家的支持),因为它未能创造一个符合俄罗斯文化的精神环境。这就是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俄罗斯的心态、意义危机、象征、原型、价值观体系,俄罗斯杀死了苏联。并且只有俄罗斯才能在新的精神基础上重建它<sup>13</sup>。二十世纪国家发展的辩证法:苏联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版本上兴起的,一个拯救了国内政治和其他领域统一的国家,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成为苏联解体的基础,从而摧毁了相关国家的共同主权和法律领域。1991年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以外的所有盟军共和国签署了《阿拉木图协定》,从而在法律上终止了《1922年条约》<sup>14</sup>。

<sup>13</sup> 辛尤科夫,法令,第239页。

<sup>14</sup> 克雷姆涅夫·彼得·彼得罗维奇,苏联解体和继承,2012年,第5页。

## 参考文献

1. 阿扎尔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俄罗斯法律思想史。莫斯科:法律文献, 1999年, 第526页。
2. 阿列克谢耶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俄罗斯人民与国家, 莫斯科, 1998年, 第635页。
3. 贝克·乌立利合, 社会风险, 在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 莫斯科, 进步传统, 2000年, 第384页。
4. 克雷姆涅夫·彼得·彼得罗维奇, 苏联解体和国家继承, 2012年, 第192页。
5. 玛木特·列奥尼达·所罗门诺维奇, 国家在价值方面。莫斯科, 1998年, 第48页。
6. 莫尔多采夫·安德烈·尤里耶维奇, 玛米切夫·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 社斯塔帕尔·谢尔盖·斯坦尼斯拉夫维奇, 俄罗斯作为特殊文明与法律类型建立的国家//波罗的海人道主义杂志, 2017. V. 6. No. 4(21). 第492-498页。
7. 莫洛佐夫·卢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娜, 现代俄罗斯国家地位问题, 1998年, 第253页。
8. 普希卡列夫·列夫·尼克托维奇, 俄罗斯社会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动荡时期)的心态//俄罗斯社会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第四期。冲击和转变时代的心态。责任编辑, 戈尔斯基, 莫斯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俄罗斯科学院, 2003年11-23页。
9. 辛尤科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 俄罗斯法律制度。莫斯科, 2010年版, 第672页。

---

---

## USSR: Cre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Empire in the Context of «Risk Society»<sup>1</sup>

**Andrey Mordovtsev,**

Dr. habil. of Law, Professor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ory and History of Russian and Foreign Law at Vladivostok

Stat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Servic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ory and History of Law and State of the Rostov Branch of the

All-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of Justice

E-mail: aum.07@mail.ru

**Alexey Mamychev**

Dr. habil. of Political Science, PhD of Law, Professor,

Head of the Laboratory of Political and Legal Research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E-mail: mamychyev@yandex.ru

**Tatyana Mordovtseva**

Dr. habil. of Cultural Studies, Professor,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Taganrog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E-mail: aum.07@mail.ru

**Abstract.** *The article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USSR as an original form of the Imperial political and legal space, a way of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socio-political and legal identity. The authors consider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es of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national stat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radigm of "risk society", recognizing its starting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Both the emerg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re an objective response to the escalating risk – taking and crisis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nd a way out of it. When considering such problems,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mental and cultural (archetypal) constan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tate and legal construction, the place and role of "personality in history", especially in the contradictory national history. In this regard,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itions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RSFSR and the Ukrainian SSR in the issue of national legal policy that influenced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Key words:** *USSR, Russian Empire, risk, crisis, political and legal space, political and legal mentality, state, Republic, monarchy, Union republics, power elites, politic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separatism, Empire.*

---

<sup>1</sup>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Gran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NSH-2668-2020.6 "National-cultural and digital trends of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legal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XXI century".

## References

1. Azarkin NM. Istoriya yuridicheskoy mysli Rossii. Kurs leksiy. Moscow: Yuridicheskaya literatura; 1999. 526 p. (In Russ.)
2. Mordovcev AYu, Mamychev AYu, Shestopal SS. Russian statehood as a particular civilizational and legal mentality type. Baltic humanitarian journal. 2017;6(4):492-498. (In Russ.).
3. Alekseev NN. Russkiy narod i gosudarstvo. Moscow: Agraf; 1998. 635 p. (In Russ.).
4. Pushkarev LN. Mentalitet russkogo obshchestva na rubezhe XVI-XVII vekov (Epokha Smuty). In: Mirovospriyatiye i samosoznaniye russkogo obshchestva. Issue 4. Mental'nost' v epokhi potryaseniya i preobrazovaniya. Ed. by A.A. Gorsky. Moscow: IRI RAN; 2003. P. 11-22. (In Russ.).
5. Morozova LA. Problemy sovremennoy rossiyskoy gosudarstvennosti. Moscow: Yuridicheskaya literatura; 1998. 253 p. (In Russ.).
6. Bek U. Obshchestvo riska. Na puti k drugomu modernu. Moscow: Progress-Traditsiya; 2000. 384 p. (In Russ.).
7. Mamut LS. Gosudarstvo v tsennostnom izmerenii. Moscow: Norma; 1998. 48 p. (In Russ.).
8. Sinyukov VN. Rossiyskaya pravovaya Sistema. Moscow: Norma; 2010. 672 p. (In Russ.).
9. Kremnev PP. Raspad SSSR i pravopreyemstvo gosudarstv. Moscow: Yurlitinform; 2012. 192 p. (In Russ.).